

锐观察

“根子问题在体制和机制上。”对于《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》这篇流传甚广的千字文章,包括“没有强拆就没有‘新中国’”的典型基层官员论点,宋亚平以一位改革派官员和体制内学者的多重视角予以解读。

一位改革派地方官员 追问“宜黄事件”

对话背景

10月18日下午,宋亚平和湖北省某位地市级的基层干部避开北京西单的繁华喧嚣,安坐在附近一隅,一边喝茶,一边对署名“慧昌”的江西宜黄干部在网上发表的《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》一文谈论不休。

这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中,有段文字令基层干部不住地点头——“……从某种程度上说,没有强拆就没有我国的城市化,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个‘崭新的中国’,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‘新中国’?”

这位基层干部说:“不管怎样,这个人讲了一句赤裸裸的大实话,就是表述得过于直白。”

他坦言,尽管暂无良策,但结局是强拆无疑,“我敢说国家大多数的重大工程,都是强拆做成的。”

这位基层干部的言论,包括“慧昌”在文中的观点,正是已转型成学者的宋亚平所一直思索的。农民、武大学生、省委干部、下海经商、读博士、上岸从政,最后转为研究者的复杂人生经历,兼有底层弱势群体、改革派官员和体制内学者的多重视角,使得宋亚平对此问题有独特的观察和思考。



人物简介

宋亚平,1957年生,湖北省赤壁市人,现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。“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农村人物”之一。

1986年,宋亚平获武汉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,分配到湖北省委研究室。1988年,他辞去公职,到南方务工经商。1993年,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专业博士学位,研究清末风云人物张之洞。1999年,在南方“商海”畅游十载的宋亚平被湖北省委召回,出任中共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区委书记。他以霹雳手段,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包括五保合一、两推一选、干部打工等在内的十四项改革措施,风生水起,湖北震动。2004年1月,宋亚平调任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,主要负责“三农”政策的宣传解释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查研究。2009年调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。

观点

■以GDP论英雄的干部管理体制是无情的指挥棒,调动着所有干部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。

■我觉得政府把什么都扛在自己肩上的这种模式,再不能维持下去了。这把政府一下子推到前面,再没有退路。

■宜黄这件事充分暴露了传统体制的弊端。这种体制不变,今天出了“宜黄”,明天还会出另一个“宜黄”。

真正的问题是,为什么基层干部会有这种想法?

记者:你怎么看《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》这篇文章?

宋亚平:他说的话反映了全国特别是第一线搞操作的党政官员的真实想法。网上很多帖子骂他。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应该是,为什么基层干部会有这种想法?

况且,在干部以GDP论英雄的考核制度下,他怎么办?他过不了关,就无法向上级党委和广大人民群众交待;如果不发展经济,不发展工业,不发展城市建设,他负责的地区就不会有财政收入。没有财政收入,就没有解决矛盾问题的基本手段。干部职工,包括老师的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来。这个官怎么当?没办法当。

所以干部拼命要发展,一有体制的原因,二有现实层面的原因。

我在咸安当区委书记时,刚开始的财政收入是3500万。过了4年,等我走时有2.6亿,翻了几倍。咸安区的财政供养人口有1.1万

人,官员有一千多人,教师有九千名。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的老师都是财政供养人员,我要养他们。如果没钱,我连他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,我必须绞尽脑汁。

记者:回到“宜黄强拆自焚”案子上,你的看法是什么?

宋亚平:当年农村税费改革之前,安徽作家陈桂棣夫妇写了一本书——《中国农民调查》。这本书给大家一个印象:(安徽)县乡两级干部向农民催谷子,赶租子,拆房子,要票子。可是,等农村税费改革完成以后,还有这种现象吗?没有了。可还是这帮干部,还是这批人在这个位置上。这说明了什么?——根子问题在体制和机制上。干部当年为什么要向农民征收那么重的赋税?是因为国家的财政管理体制规定,县乡两级财政主要收入是由农民来缴纳。但是农民在农业上没有赚钱,要再上缴繁重的税费,他就没法过日子。最后闹得不可开交,

经常死人。

记者:你所说的根子问题的具体表现是什么?

宋亚平:第一,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情况下,以GDP论英雄的干部管理体制,是无情的指挥棒,调动所有干部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。

第二,是我们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。在正规的市场经济理论里,政府是一个裁判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。但在中国,政府是第一责任人。这种由政府主导经济建设的模式,决定了政府权力无所不在。中国现在是在全被政府扛在自己的肩上,这就把政府一下子推到前面,再没有退路。

第三,我们的社会价值观目前几乎是一切朝钱看。这里面既有个体,也有群体;既有农民代表,也有市民代表。包括不少富人阶层,知识分子和官员在内,亦难以正确处理个人、集体、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。

政府在很多问题上为什么这么强势?

记者:看到宜黄自焚者家属、钟家姐妹上访在机场被截,被人跟踪,自焚者尸体被强行火化时,你有什么感想?

宋亚平:原来我搞企业,在社会最底层,可以说受尽了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的欺压与凌辱。后来我当地方官,就知道政府在很多问题上为什么这样强势。我想我可以站在比较客观公正的角度说话。

宜黄这件事要透过现象看本质——怎么通过制度性的改革与

建设,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我觉得政府把什么都扛在自己肩上的这种模式,再不能维持下去了。政府该管什么,不该管什么,应有一个明确的责任边界。现在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高度注意,即很多官员十分崇拜甚至高度迷信政府的行政权力,认为只有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,才是效率最高,成本最低的。无论什么事情,只有政府亲自抓在手里才能办得成。

要从根本上避免这些问题,就必须要通过制度改革,另辟蹊径。这就对政府自身的职能转换和政府的行为方式,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——政府要革自己的命。

宜黄这件事当然属于坏事,充分暴露了传统体制的弊端。但在很多人看来,只能算是他们书记、县长不走运,被媒体捅出来了。没有捅出来的还不知道有多少。这种体制不变,今天出了“宜黄”,明天还会出另一个“宜黄”。

为什么“强拆”事件大都出现在城中村?

记者:1991年中国拆迁条例出台。那时你正好在海南洋浦开发区做拆迁办主任。有人说拆迁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,而现在正处于“后拆迁时代”。

宋亚平:过去拆迁不存在这些问题。那个时候,几乎没有房地产这一说,更没有现在这么火,很少人认为这是能赚钱的。

那时对社会公益用地的把握也比较明确而严格,如建设学校、医院、修筑公路、铁路等等。工矿企业也是国有的,一切都犹如“肉烂在锅里”。农民土地被征之后,一般可以由村集体再重新调整。所以,1991年以前,很少出现强拆这个问题。

现在不一样了,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很便宜地把土地从农民手中征过来,马上以高出数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,再卖给房地产开发商盖成房子。然后,开发商又以更高的房价收获巨额暴利。这自

然使大众觉得,征地拆迁的结果,总是在为富人创造大发横财的机会。

与开发商获得的巨额暴利相比,农民得到的连个零头都算不上。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动带来社会的和谐。如果社会不公平、不正义的问题不解决的话,发展越快,问题越多,危险越大。

记者:你怎么看征地拆迁过程中农民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?

宋亚平:我总在想,那些边远地区广大农村的农民群众,由于受国家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的制约,他的地卖不出去。别说30万元,就算3万元也没人敢要。这些城中村、城郊村、园中村的土地,之所以能卖到30万元一亩,完全是工业化、城市化发展的结果。你的土地升值所产生的好处,是不是应该考虑通过某种政策与法律的规定,由政府进行必要的平衡,以保障全体农民都能够共享改革

开放带来的发展成果?

为什么绝大多数严重强拆甚至导致人命案的事件,都出现在城郊村、城中村、园中村,或者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比较快的地方,在广大的边远农村基本上没有。这是不是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?反映的是不是农村内部新的不公平?

记者:可我们也知道,有些农民拿不到他应拿到的那部分拆迁补偿。

宋亚平:现在,一般程序是这样,政府用自己的财政资金,不够就到银行贷款,成立一个土地储备公司,把土地从农民手中征过来。然后再三通一平,卖给开发商。这里就存有一个问题,政府很可能形成债务。政府一时掏不出那么多钱,就可能在征地拆迁的费用支付中出现拖欠,拖欠到最后,真正的余款能不能到达农民手中?

各地都在拼命发展,强拆怎么得了?

记者:你怎么看目前的土地“增减挂钩指标置换”政策?

宋亚平:工业要加速,城市要扩张,必须得拥有土地。由于近年来国家一直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,土地资源日益严重短缺。各级地方政府要想发展经济、改善民生,彰显政绩,就必须千方百计突破用地指标匮乏的这个难关。有了用地指标,就不愁招不到项目,也可以去银行抵押贷款甚至能够直接卖地变现。因此,当国

家提出“增减挂钩指标置换”政策之后,立刻获得了全国各级地方政府空前的衷心拥护。这样一来,强拆就不仅仅在城市周围发生。现在,全国所有农村都动起来了。只要把分散的农民集中在一起,把他们原有的村庄,复垦成耕地,节约出来的面积就成了指标,这个指标可以公开买卖,你说这个强拆今后怎么得了?各地都在拼命发展,强拆就是不可避免的了。

记者:这种拆迁还有一些好听的

的名目,比如“以承包地换社保”、“以宅基地换房”等所谓“双置换”。

宋亚平:各种名堂都出来了。说一千道一万,根本目的是打农民土地的主意。很多地方政府,我不客气地说,挂的是羊头,卖的是狗肉。现在,“统筹城乡发展”在一些地方变成了只“统”农民之地,不“筹”公共服务。

宜黄自焚事件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发生的,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。据《南方人物周刊》